

这支部队打胜仗，靠的是“补丁锅”“被面旗”……

新华社 刘翔霄 原勋

百年奋斗征程，足迹不计其数。一口“千疮百孔”的行军锅，一件应急渡河用的“土工具”，一面质地“特别”的战地奖旗……

它们诉说着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铭刻着永不磨灭的精神。

行军锅上17枚特殊的“奖章”

一口打着十七个铁补丁的行军锅，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最为引人注目的展陈之一。

长征期间，红军炊事班战士除了背粮食，还要随身携带各种炊事用具，每个人负重达三四十公斤。过草地时，上级下命令轻装前进，炊事班战士将随身携带的盆盆罐罐减了不少，唯独舍不得这口行军锅——就算没米下锅，还可以用它给大家烧点热水喝。

过草地时，前面的炊事兵倒下了，后面的炊事兵来不及掩埋战友的遗体，只能强忍悲痛，背起这口锅继续前进。

“长征结束后，很多炊事班战士都牺牲了，那口锅就成了炊事兵心中最珍视的东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史永平说。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这口行军锅也跟着来到了太行根据地。

1938年，八路军对日军展开反“九路围攻”。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村民李焕兰的丈夫当年参加了八路军担架队，一次，他在抢救伤员时，发现了一位浑身是血、伤势严重的八路军炊事班长。奄奄一息之际，炊事班长仍紧紧地抱着一口行军锅不肯放手。他说，这口锅很重要，曾跟随他爬雪山、过草地，煮草根、煮皮带，救活了不少战友，也给他挡了不少子弹，他实在不忍心把它丢掉……希望李焕兰的丈夫帮他把这口锅保存下来。

李焕兰的丈夫含泪答应了老班长的请求，把它拿回了王家峪。

后来，八路军总部进驻王家峪，李焕兰又把这口锅送回，供战士们继续使用。

20世纪80年代，这口曾立下“汗马功劳”的锅被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史永平说，这口铁锅上的补丁足足有17个之多，就像17枚特殊的“奖章”。

泛黄的“羊皮浮筒”

山西石楼县，红军东征纪念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件泛黄的羊皮浮筒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1936年。

“当时，阎锡山的部队把渡船扣押在黄河东岸，红军没有工具，渡河就成了一大难题。”山西红军东征纪念馆馆长刘剑说，于是红军采取了老办法——到黄河边走访、发动群众，请群众出谋划策。

有群众提议，把羊皮剥下来做浮筒，夹在腋下，就能过河。为了帮助红军渡河，群众纷纷把家里藏的、没有被阎锡山部队



太原解放纪念馆展陈的一面奖旗，旗面是用被子面做成

没收的浮筒捐了出来，有些老百姓甚至把自己家的羊也牵来了。没过几天，就做了几百只浮筒，这些浮筒是石楼民众助军渡河的“功臣”。

1936年2月20日晚8时，东征红军开始渡河作战。石楼县老船工任永忠撑的船比较大，一次能载百余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往返运送红军。抵岸后的红军迅速向敌人发起进攻，打开缺口。

送红军过河后，任永忠又送儿女参加了红军，然后自己把船卖掉，到陕西参加了革命。

当时正值寒冬，又是夜间，黄河上有大块的冰凌块，渡河难度很大。幸有任永忠、白汝耀、许茂前、乔永生等老船工军民一心，才保证了红军战士安全渡河。

“当时山西很多进步青年跟着红军到了陕北，没过多久就参加了红军。”刘剑说，东征红军在山西扩军8000子弟，当时涌现出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事迹。

一面特别的奖旗

步入太原解放纪念馆，人们总会在一面奖旗前驻足良久。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为了支援人民军队打胜仗，老百姓纷纷有力出力，捐款捐物。”太原解放纪念馆讲解员曹艾洁说，这面红底白边的旗，是奖给在解放太原战役中作战勇猛的一支部队的，旗面却是用老百姓捐的被子面做成的。

太原市阳曲县店子底村是解放战争时期攻打太原的支前模范村。当时，从各地汇聚来的战斗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汇聚至此，并从这里输送到前线。

“当年，老百姓纷纷把家里的门板抬了出来，五里长的通道都是用门板等搭建成的工事。”店子底村原党支部书记黄根明说，整个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们腾出窑洞、大炕，积极支援前线。

“一位炊事班长给了我爷爷一双靴子，他说，老乡，把这个给你，我们要进城了。第二天，6个伙夫回来后，在炕上不说话。那一晚牺牲了130个人，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店子底村90岁老人李合林的丈夫当年在前线抬担架，她和公公婆婆先后照料了二十多位解放军伤员。“那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我把鸡蛋攒起来，给战士们做成了一碗碗的鸡蛋汤。”李合林说。

太原战役持续6个多月，共有24万群众参与支前，动用畜力5万多头，门板50万块……

“这些留存下来的历史实物，无不体现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战斗力、生命力，体现了民心所向。”山西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巨文辉说。

在东京神田探访陈独秀的留日印记

新华社 郭丹 钱文

“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怀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理想，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寻求答案。

由于是自费留学，陈独秀在日本并未留下系统记录。在东京神田，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来日本时，曾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会馆登记，同时加入留学生组织“励志会”。

记者在保存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文件中找到了陈独秀当时登记的内容：陈乾生，光绪27年10月(旧历)来日，24岁，安徽怀宁，自费，所在学校“东京学校”。

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来日，与章太炎、邹容等爱国人士成立“青年会”。1903年3月31日，他们闯入长期欺压留学生的清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的家中，陈独秀挥剪，以“割发代首”的方式剪下姚文甫的辫子，将辫子挂于留学生会馆屋梁上。

1907年春，陈独秀第四次来日，在神田的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过两年多。这所学校如今还在，但已是一所私立男子高中。陈独秀回国后，在1910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一套四册的《模范英文教本》，足见他当时学习英语的用心。陈独秀在正则英语

学校期间，与怀有革命理想的中国留学生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日本人士广泛往来。

1914年7月，陈独秀受章士钊邀请第五次来日，主要编辑杂志《甲寅》。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第四期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因此文“扬名天下”。陈独秀在文中批评当时国人只有盲目的“爱国心”，而缺乏建设近代国家的“自觉心”。此文一出，引起争议，批评信件如雪片般涌来，《甲寅》受到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攻击。

数月后，当人们获悉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要全部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才理解了陈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对陈独秀也由原来的谴责和抗议化为接受和推崇。

除了投身《甲寅》的编辑工作，陈独秀在第五次留日期间还学习了法语，希望能关注更多西方进步思想。陈独秀学习法文的雅典娜法语学校，现已从当年的神田锦町搬迁到了神田骏河台。

综观陈独秀的留日历程，正如日本庆应大学学者长堀祐造所言，“陈独秀在日本学会了日语、英语和法语，是不小的收获。学习这些外语，对他了解各国新思想有很大帮助。同时，陈独秀在日期间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卓扎滩村的绿色发展之变

新华社 严赋憬 蓝翔 张曼怡

“今年才过了半年，就分了4000元，我正想着引天然气进家里，这不就有着落了。”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的卓扎滩村，46岁的村民刚莲花对记者说。

6月30日是卓扎滩村2021年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在村广场，400多户、1800余名卓扎滩村民前来领取上半年卓扎滩原生态景区产生的共计216万元分红。村民们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排队领取相应的分红，高原湛蓝的天空映衬着大家脸上的笑容。

“多亏了这个生态景区，现在我们不仅能领到分红，而且村子建设也越来越好了。”刚莲花说。位于村子东边的卓扎滩原生态景区建于2018年4月，占地面积4.5公顷，将田园风光、民俗文化和观光娱乐融为一体，成为村子的支柱产业。

景区建立之前，这里曾经是一个砂场，是全村最脏的地方。连年来采砂、碎砂、洗砂，不仅带给周围村民粉尘和噪音的困扰，也使得原本清澈的河水变得浑浊。

“砂场运行后河岸周边越来越脏，甚至逐渐演变成村民们倾倒垃圾之地，砂场变垃圾场，苦不堪言。”卓扎滩村党支部书记颜章东回忆起过去，备感心痛。

2017年砂场因为生态治理而关闭，如何处理这块闲置的土地，成为一大难题。卓扎滩村交通便利，河道、天然林和土族文化是村庄的优势条件，发展乡村旅游，或许可以打开新局面。经过全村的商议，决定以全村村民自愿入股的方式投资，筹集建设资金，共同享受旅游收益。

景区建设带动村庄旧貌换新颜，为了配合发展生态旅游业，卓扎滩村开始了一系列改变之举：铺设柏油路、植树绿化、整治卫生……

过去脏乱的村庄变得整洁美观，平整的道路将村落规划得齐整有力，土族风格的院落颇具特色，道路两旁的葱郁柏树和黄灿灿的油菜花交相呼应，美不胜收。

除了村子本身的环境改善，生态景区这一村集体经济也给每一位村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受益。回忆起2018年入股的场景，49岁的村民雷有花历历在目。当时她丈夫因意外去世不久，她靠着打零工和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她认为入股景区是自己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2019年第一次分红我就拿到了2000多块钱，日常的生活开销就有了。”雷有花说。

据了解，2018年9月至2021年6月，景区接待游客近2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000余万元，带动16家农家乐发展，辐射带动周边5个村农畜产品销售，为村民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累计给村民分红436万元。

“下一步，我们要开发景区水上娱乐项目，做强田园生态综合体，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让生态致富这条道路走得更远、更坚实。”颜章东说。



村民刚莲花向记者展示刚刚领到的分红